

赵树理、张爱玲的
两重向度
指向传统与指向未来
“琐琐碎碎”的故事
“从头说起”的小说

大事小情

董之林
——著

当代文学史
叙述内部的张力
“戴了着色的眼镜观察”
历史“更其靠不住”
新与旧的胶着
小说革命化
改造革命化

小说故里：“精神还乡”
《山乡巨变》缘起
社会转型 艺术驱动
激流勇退
寄情自然

大事小情

董之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事小情/董之林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556-6

I. ①大… II. ①董…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720 号

责任编辑 陈佳妮

封面设计 余 洲

大 事 小 情

董之林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3 字数 226,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56-6/I·1633

定价 36.00 元

题记

《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下册)一书出版前,上海书店出版社王为松先生曾问我,下册第六章《亦新亦旧的“新时期”小说》所涉及的范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何以放入“十七年小说史论”中?我怎么回答的,现在已记不太清,大概说有这样一个后续,使读者不感觉突兀,有助于读者了解新时期小说的来龙去脉。

2008年《热风时节》出版后,有感于当时的写作框架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来不及展开,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以这一时期小说为轴心,兼及更广泛的时间跨度和叙事范畴,对读者了解这段小说史或有所裨益。如今,历史讲述方式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作为材料数据,经常被引用在政治史、思想史或读解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著作之中,这当然是其价值的重要方面。但小说和文学毕竟有自己的身份,通过这些个案分析可见,即使政治立场鲜明的小说家,其文学大梦也与意识形态若即若离,而与小说和文化传统渊源不断,成就了小说史上一个个特殊阶段。

西方新历史主义有一种看法,人们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物,而是被叙述者建构起来的。因此阅读历史,不仅要看历史所讲述的年代,还要关注讲述历史的年代。新时期文学建立在批判旧时期文学基础上,我开始

对此也深信不疑。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冷静下来分析,就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新与旧往往表现在同一时期、同一个作家身上,只不过现实被称之为新,过去却被视之为旧;曾经引领潮流、光鲜一时的作品,后来竟是百孔千疮、陈旧不堪;或者变旧为宝,成就一时之新。比如,说新时期文学直承五四传统,回避“十七年”,便是一例。新时期伊始,赵树理、姚雪垠等当代小说家及其作品被否定;而王林的小说《腹地》1949年刚出版就受到严厉批判,强令作者修改,以至于大部分读者时隔半个世纪才相其貌。这样一路寻踪下来发现,孰新孰旧,如何评判,政治的干预起重要作用,甚至掌握作品生杀大权。

政治无所不在,特别是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变,无论五四、“十七年”,还是新时期,政治都强烈地影响和导引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在大力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文艺更被看作政治斗争晴雨表。然而如此高调的政治,对文学和小说也有无可奈何的一面。其中不容忽略一点,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在文学创作中,都有一个被接受、撒播、移植和变异的耗散史。就此而言,优秀的小说家择善而从,凸显其经验储备、提炼取舍、对现实敏锐的感受、艺术创造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当代有这样一批优秀的小说家,赵树理、姚雪垠、王林等人的小说就是这一文学传统在当代首开先河之作。

把十多年来陆续写成的有关当代小说个案分析的文章、讲稿汇集起来,把对同一作家或同一性别小说家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不仅可以看到小说写作过程的不同侧面,也可以找到研究者不断学习、有所深入的足迹。上面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看法,并非一日形成,而是通过撰写这些论文,一步一步得出的结论。

由于涉及同一时期作家作品,各篇中材料和表述有重复的问题,原打算做一些删节,使各篇内容相对集中在某一方面。但一经处理,思想的逻辑被

切断,文章显得上气不接下气,反而让人不甚了了。所以目前收集在这里的依然是原文,也算立此存照,让读者看到研究者在写作过程中更真实的一面。

2016年8月8日

于北京城南

目录 / Contents

题 记	001
-----------	-----

上篇

视角改变视界（访谈录）	003
-------------------	-----

叙事缘起——反思“忆苦思甜”模式——文字蒙求的启示——
“刺猬与狐狸”之辩证——布满张力的艺术理念——时间序列
中的历史相关性与文化网络

正视当代文学史叙述内部的张力	031
----------------------	-----

“戴了着色的眼镜观察”历史“更其靠不住”——新文化与旧传
统胶着的年代——小说革命化与改造革命化的过程

中篇(1) 小说故里——论当代“精神还乡”的一种写作动因	043
------------------------------------	-----

《山乡巨变》写作缘起——社会转型期的艺术驱动力——急流
勇退与寄情自然——大众化困境与精神还乡

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	065
------------------	-----

取名“立波”(Liberty)——作家早期文学道路——按照生活应
该成为的样子——艺术为生活提供美的形式——“从血管里
出来的都是血”，文学镜子照出作家心灵——与鲁迅文艺思想
交锋与折服——从《秘密的中国》到《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及《山那面人家》

回想“春暖时节”——一份“大跃进”年代的女性

写作个案 089

“杯水风波”里的时代脉动——女性角色分裂——向传统情感方式回眸——时代女性楷模变异——趋新与守成之间无声的博弈

“静物写生”中的艺术变奏——论茹志鹃、刘真的

“十七年”小说 101

《百合花》争论始末——斗争年代呼唤纯真——“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战时新女性：从《我和小荣》到《英雄的乐章》——《长长的流水》中大姐的“委屈”——女性写作的前世今生

中篇(2) 由历史小说看五四时代的延续——论《李自成》研究

再度兴起 115

茅盾与姚雪垠八十余封通信——历史老人心有灵犀——《李自成》与新史学运动——姚雪垠与郭沫若关于李岩人物形象的分歧——崇祯王朝与大顺王朝殊途同归的重要原因

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 127

“1957年动笔”的写作动机——以郭沫若“私淑弟子”自诩——“历史科学”与“艺术使命”的纠葛——明王朝、起义军和清军三足鼎立的小说布局——崇祯与明王朝悲剧探究——起义军结局寻踪

“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以《腹地》

再版为关注点 153

《腹地》事件来龙去脉——“旁生枝节”惹来的风波——正面人物形象的“小恩小怨”——好人与坏人真伪之辨——沈从文的学生——写实主义的本质及其传承

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有感于《王蒙自传》 180

“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旧时代与新中国：《活动变人形》与《青春万岁》——一种人生自救方案——王锦第父子的抒情气质——从“个人机密”到“国家日记”

下篇

“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从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说起（讲稿） 195

三仙姑形象的生活隐喻——“让故事自身去说明”的写实要义——小说家的苦恼——“文艺方向”与小说实际矛盾重重

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 215

“小调”改变了原有的抒情方式——“赵树理的文学”与“茅盾的文学”——不拘格套的“问题小说”——启蒙文学：批评与向往的双重变奏

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论赵树理、张爱玲小说的两重

、文化向度 225

抗战引发文学向传统回眸——文化潮流向度之一：指向传统经典的美文——文化潮流向度之二：指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尝试——“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琐琐碎碎”的故事和“从头说起”的小说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

..... 251

现代性的一种粗糙——难以“断裂”的现代小说趋向——“文摊”文学的志向——《小二黑结婚》、《李家庄变迁》、《李有才板话》：开启文学新时代——“不断增大的机制”与“撒播和移植的原则”

后 记 278

上 篇

「事有是非，义难隐讳」

（宋·苏轼）

视角改变视界（访谈录）^①

叶立文 董之林

叶立文：董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卓有建树的学者，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您为什么将“十七年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志向？您介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出发点是什么？

董之林：感谢立文和《新文学评论》，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把十多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心得加以总结。我在职期间主要从事文学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处理稿件的同时，也使我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最初的研究所得是讨论新时期知青小说《走出历史的雾霭》，也做过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接受美学理论的翻译，以及对当代作品的评论（后者多收入《盈尺集——当代文学思辨与随想》），并开始探讨“十七年”小说。我想，从事这项研究，大概主要与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有关，而不在于当今有多少引人瞩目的宏大命题。那些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后来变成了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探讨历史有如探讨个人的精神生活历程。另外，我对问题的兴趣也随时间推移、学术眼界不断拓展而逐渐深入，旧的谜团解开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引发自己的思考跟进，寻找新的答案。由于这种经历，我想，一个学者的“学术志向”不是自己事先可以选定的，而是伴

① 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该文应《新文学评论》的《新文学史家访谈录》栏目所约，原载《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随学术发展和自我认识不断加深被选定的。

叶立文：在我的印象中，您以“十七年文学”作为历史研究的切入点，但学术关怀却不止于此，比如您对十七年文学的很多看法，实际上都与八十年代文学密切相关。在您看来，“80年代”这一“亦新亦旧”的文学时代对于您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董之林：我的专业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部分），在80年代启蒙话语占主导的背景下，“十七年文学”显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阶段。仅举小说为例，因其上限是五四运动形成的新文学繁盛期，不仅文学方面大师辈出、果实累累，在对传统资源的清理和推陈出新方面也成就不菲；而其下限是文革爆发，文学期刊停刊、出版社停业，一时无限上纲上线的大批判肆虐，致使创作凋零。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先是全面肯定“十七年文学”，进而把文革与“十七年”政治运动对文学的影响联系起来，再后来甚至将两者画上等号。于是便有“十七年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化“断裂”之说，意思是直到80年代“新时期”，现代文学传统才得以续接。“断裂”一时成为“十七年文学”背负的“红字”，既然有如此不可饶恕的罪责，那么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便无从谈起，成为一段历史空白。

但80年代这种说法，与我探讨新时期知青小说时了解到的情况不同。不论大家如何诅咒过去，在当时一些比较著名的小说家身上，不难发现“十七年”的影子，比如《绿叶》《西望茅草地》《黑骏马》《高原的风》之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边疆晓歌》、《你到底要什么》（60年代前苏联小说中译本）；《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题材小说之于《百炼成钢》、《铁水奔流》、《州委书记》（60年代前苏联小说中译本）等。且不论那些兼具“十七年”和新时期生活经历的读者或作家，其人生履历无法用“断裂”来定义；单从文学创作与批评这两条线索看，80年代对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

表述与概括,依然包含对社会本质、时代精神推断所赋予的文学价值取向。这一点与“十七年文学”观念在很大成分上是一致的。虽然前后期作品中具体的褒贬对象变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形象定义被转换了,或者悲剧多一些、喜剧少一点,但至少在1985年以前,在新时期文学主要阶段,文学的审美理想与“十七年”并非迥然相异。因此我在《旧梦新知》一书中说,1980年前后是“亦新亦旧”的文学时代。

叶立文: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历史的连续性因为研究者不同的价值立场而被断然割裂。我在一篇讨论《热风时节》的文章中说过,为反拨早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八十年代的一些文学史家在描述“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激进的启蒙立场展开其历史叙述。在此过程中,裹挟着文学史家启蒙诉求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弘扬人性正义的“求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十七年文学”的知识建构。换句话说,文学史家这种求善不求真的启蒙学风,实际上很难保持历史叙述理应秉有的客观立场^①。相较之下,您对“十七年文学”历史空白的弥合、对八十年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探寻,似乎都排除了以启蒙主义为元话语的史学立场。如果是这样,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一般学人所期望、如您所描述的“不以今人尺度为尺度,尽量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让叙述还原历史本身”?^②

董之林:对历史做减法比较容易,但剪掉一段所谓“空白”之后,那些被剪掉的历史元素在后来不同场合又顽强地浮现出来,却使后来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这里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如果这是一段大家都厌恶的历

① 叶立文:《启蒙神话的祛魅与改写——论董之林〈热风时节〉中的历史叙述》,《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② 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史,为什么研究者偏要说来说去、乐此不疲,好像成心要与人的自然情感相悖?但事实又是如此不可思议,并没有人真正讨厌历史,三皇五帝史,近代民国范儿,当时人也许并不看好,现时人却津津乐道。看来人们讨厌的不是历史,只是不喜欢自己的过去,也就是从自我某一角度所看到的历史。比如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一会儿说:1949年以后的文学比此前的文学如何如何的好;一会儿又说:“十七年文学”比新时期文学如何如何的坏。历史评价与时俱进,思维方式却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看作是受启蒙观念影响的时代变异,那么不如称其为“忆苦思甜”更确切,它也应该是读解历史的一种方法或一种角度。不过当时我对这种方式还只是提出疑问,并没找到一种新的、在思想方法上与之不同的解决方案。

关于如何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我的难言之隐即在于那是我一直说不清楚的一大堆问题。有时候我也想抓住一个现成的角度,或套用当年一种理论模式,先写了再说,但随即意识到在一种理论模式下(如革命现实主义)可能自圆其说的表述,必然以牺牲从另一角度(如人本主义)所看到的历史为代价。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家世”,有产生的语境和针对的问题,而且是对某种思考范型的概括与总结,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受知识传承影响,人们可以借鉴其方式方法,但不要异想天开,以为从此便找到一把万能钥匙。

现在回想起来,我开始从事“十七年文学”研究迈出的第一步,竟然有点儿像古人在《文字蒙求》一书中的说文解字^①,教书先生为小孩子识字发蒙,把象形文字拆解开来,看每一部分原来在小篆字体结构中的意思,也就是最终形成文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有机成分各是什么。先生为让小孩子记住成百上千个象形文字而使用这种拆解的办法,有助于儿童对中国语文

^① [清]王筠:《文字蒙求·自序》,载《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

和文化的初步了解,或称为“入门”,即所谓“蒙求”。反之,如果只把文字当作由横、竖、撇、捺等单一笔画拼凑起来的,那么一笔一画地记,不大好记,识字发蒙的效果也不如前者。对我而言,这种方法重要的一点在于,被分解的各种元素是有意涵、可增殖的。我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第一本书《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①,讨论对象是20世纪50年代作品,我将其分为“青春体小说”“乡土情结小说”“诗化小说”“革命传奇小说”和“史诗类小说”。我把这一时期小说分解为不同的艺术类型,希望从艺术类型角度勾连这一时期小说大体的模样,为“一个理想飞扬的时代”留一份历史存照。这种写作方式虽无法囊括全部作品,却一定会使每一类型元素中的意涵增殖,比如它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文化成因,以及当时阅读环境和受众市场对写作无形的诱导与干预,等等。总之,通过这样的分解与重新定义,这些隶属于“十七年”的小说,显然不再是政治斗争“晴雨表”“政治附属品”便可一言以蔽之,而在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姑且将此看作是我介入该领域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

叶立文:您的这种尝试显然是将文学史研究的叙述形式问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论是《追忆燃情岁月》里的艺术类型研究,还是《热风时节》中初春与百花时代的时间形态分析,可以说都摒弃了当时学界所普遍操持的理论模式。但这种缺少了先验价值立场的叙述形式,反倒更能映衬出您对历史一元论和本质主义的反思。您曾经说过,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贴着作家作品、以及批评家当时的批评,贴着那些被丢失、或已经被‘遗忘’得七零八落的历史碎片,去看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它们与艺术史的源流关系,与由于现代激变而产生的一种张力关系。”(参见董之林致笔者信,2013

^① 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